

试析毛泽东诗词修改与自注的史料意义

刘佰合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内容摘要】毛泽东诗词在创作过程中,大多有各种形式的修改,在作品发表后,毛泽东又多次以书信、谈话或批注的方式对其诗词进行说明与注解。这些修改与自注作为一种史料,在理解与考察作品的创作情境及其现实引申意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 诗词 修改 自注 史料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3-0077-03

毛泽东诗词在创作过程中及发表后往往有较大修改和变动,但目前的诗词研究者大多注重诗词的最终定稿,而忽略了修改情境及其蕴涵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多次以书信、谈话或批注的形式对诗词与词句进行注解与说明,为我们准确理解作品提供了良好的路径,但其意义并不仅仅在此。毛泽东诗词的修改与自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却一向为研究者忽略,本文不揣浅陋,试就此进行初步探讨与分析,以期抛砖引玉,有不当处,敬请指正。

一、毛泽东诗词修改的基本状况

1963年11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莫桑比克外宾时论及诗词创作与修改的基本情况,“有些诗不能用,要经过修改,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经过修改,甚至于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思想好,但文字表现不好……我要修改,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一想。”^[1]这段话体现了毛泽东对诗词修改的基本态度,也说明他对作品修改非常重视,实际上许多传诵一时、历久不衰的经典作品也正是经过反复修改而来。毛泽东对诗词作品的修改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就其形式而言,主要涉及如下几种类型:

标点符号的修改。1957年1月号《诗刊》发表《菩萨蛮·黄鹤楼》时,下阙标点为“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依作者意将此处分别改为“黄鹤知何去?……心潮逐浪高!”如此则更有力地表达了作者的心境。又如,《水调歌头·游泳》下阙第二句原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后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2](P256),使诗境更为宏阔。

标题与小序的变动。《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最初发表时没有标题,1963年出版《毛主席诗词》方加上“和柳亚子先

生”作为标题;又《水调歌头·游泳》原标题是《水调歌头·长江》^[2](P258)。根据李锐的回忆,《七律·登庐山》原来有一个小序:“1959年6月29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后据他人建议予以删除。

单字单词的更换。《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之“水”,原即为“浪”;《清平乐·六盘山》下阙第二句“红旗漫卷西风”中的“红旗”,首次发表时为“毫头”,后作者应宁夏同志所请改为“红旗”;又如《沁园春·雪》中的“原驰蜡象”是诗人接受臧克家的建议,由“原驱腊象”改来;“别梦依稀哭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七律·到韶山》)中的“哭”在定稿时改作“咒”。

句子的修改。《七律·到韶山》最后一句“遍地英雄下夕烟”,在定稿前原为“人物峥嵘胜昔年”,又作“始信人民百万年”;《七律·登庐山》的尾联“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曾作“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

上下阙的调整。《采桑子·重阳》一词就对原上下阙作了对调。

二、诗词的修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毛泽东对诗词的修改大多是出于艺术考虑而进行的字、词、句、韵等方面的改定,但也有部分修改,因为距离原作时间已有相当间隔,加之世事变迁,大多会融进修改时的思想认识,换言之,这部分诗词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原作环境,更包含修改时的具体情境。单就史料角度言,原作当为第一手史料,价值最高,修改后的作品就应成为二手文献了,但由于融入了修改时的意识,对考察此时的人物而言,改稿则又是第一手资料,有较高的价值,若能够将二者结合起来考察,更能清晰地反映出作者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的心路历程。试例析如下:

* 本文为安徽省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资助项目(2008jyxm494)。

* 作者简介:刘佰合(1973-)男,安徽宿州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秋收起义发动后,按照原定计划,各部队分别从修水、铜鼓和安源向平江、浏阳与萍乡攻击前进,此间毛泽东写下《西江月·秋收起义》,谓“军叫工农红军,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明确交代了起义部队的进军路线,只不过就艺术作品言,稍显直白了些。后作者对它做了修改,除将“沉”改作“愁”外,主要是把“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改为“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秋收起义各部队是三路进军,但词中只能体现其二,或许是出于这一考虑,作者遂将略显直白的“修铜”、“平浏”改为“匡庐”、“潇湘”,这样便更富诗韵,也使对进军路线的描述更全面;更重要的是,因为是在进军途中所作,原句显然只是记述了秋收起义的第一阶段,而改后之作,则包含了起义第二阶段的重要信息。进攻大城市遭到挫折后,起义部队必须在继续进攻和实行退却之间作出抉择,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经过激烈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即“议决退往湘南”^{[3](P151)},最终选择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从而开启了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改作充分凸显了秋收起义的整个过程与历史意义,显然原作不能体现这一新变化。

1923年底毛泽东与杨开慧在长沙分别后写有《贺新凉》一首,目前发现的最早手迹是作者30年代后期于延安书赠丁玲的作品(该手迹最先公开发表于1992年12月《中国风》创刊号,写作《贺新凉》),当为最接近原作的一稿,全文如下: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无绪。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曾不记、倚楼处?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我自精禽填恨海,愿君为翠鸟巢珠树。重感慨,泪如雨!

该作表明毛杨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误会”,而且不只是杨对毛“误会前番书语”,毛对杨亦有误会,“凄然无绪”正表明二人间的情绪与重大分歧。全词重心在于令毛“重感慨,泪如雨”的别离场景及可能的将来,作者甚至准备断肠孤旅天涯,要“割断愁丝恨缕”,此后便“我自精禽填恨海,愿君为翠鸟巢珠树”。多么严重的口吻!大有“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的意思。研读可知,此稿并非如一般论者所言“不同于古往今来一般爱情诗词中所刻划的那种男女之间缠绵悱恻的狭窄感情圈子”^{[4](P104)},而是恰恰相反,注释家将其理解为普通离别之作亦有穿凿附会之嫌,甚至权威的《毛泽东传(1893—1949)》也误用了该词,认为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长沙很“高兴”地生活了三个月,至分别“临行前,毛泽东强抑感情作《贺新郎》相慰”^{[3](P94)},让人感觉这是一般的别离。

作于1923年的《贺新郎》和大约成于1921年的《虞美人·枕上》在创作思路与风格方面非常相似,都类于婉约派词风,只不过一言思念,一言别离。曾于杨开慧处看过《虞美人·枕上》的李淑一在1957年写信给毛泽东,请其将该词写出,毛回信说:“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5](P298)},可见毛

泽东对这类作品是不甚满意的。所以大约与此同时,因为已是“忽报人间曾伏虎”之后,毛在思念早已为革命牺牲的杨开慧的同时,重新把《贺新郎》拿出修改,把原作中带着重号的分别改为“苦情重诉…人有病,天知否?…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环宇。重比翼,和云翥”,删去了误会之语,从而使词意大变,代之以寄托未来希望,突出了对革命胜利的壮志和信心,体现了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该稿最早发表于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为目前的通行定稿。两稿都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诗词的创作思路,也表达了特定历史时刻作者的真情实感,原稿立意儿女情长,改稿立意革命乐观主义,亦表现了对牺牲爱妻的怀念。但必须注意,我们不能用改稿的立意去注解原作的历史情境,因为作为史料,原作与改稿所能说明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以后来的修改稿去注解或说明原作时的具体历史情境(用这种思路注解毛泽东诗词作品并非仅此一例),难免差之千里。

三、诗人自注为理解创作情境提供了具体资料

部分作品公开发表后,针对“注家蜂起”的状况,毛泽东认为“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5](P459)},遂以书信、谈话或批注的形式对其进行说明和注解(本文将其称为自注,主要有《对〈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批注》和《对〈毛主席诗词〉若干词句的解释》)。诗人自注为我们深刻理解作品提供了正确的路径,同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意义。

作者自注大体可分为两类,其一是针对某些字词、典故或背景的具体说明,这类自注不仅可以帮助读者正确解读诗词,而且提供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史料。毛泽东注《沁园春·长沙》中“击水”曰:“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5](P460)},既为我们提供了作者长沙求学时代业余生活的生动素材,也可由此追寻晚年畅游长江情结的历史渊源。有些自注是交代诗词创作的背景,同时也为特定的历史事件提供了价值很高的史料,例如对《忆秦娥·娄山关》的注解和说明,就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当地的自然风情和具体的战斗过程^{[6](P365,315—316)}。毛泽东《七律·长征》中“水拍”注为“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5](P461)}。此注不仅说明了由浪改水的缘由和具体情况,更体现了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具有虚怀若谷的情怀。毛泽东在《给李淑一的信》中曾说到“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指《虞美人·枕上》),因为该词颇有婉约派儿女情长的意味,结合诗人“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5](P304)}的感觉,便可进一步理解作者对同有婉约派风格的《贺新郎》进行词意修改的深层意识。

部分自注对理解诗人遣词立意颇为重要。《七律二首·送瘟神》发表后,其中的“坐地日行八万里”有不同的理解,作者均认为不确,先后两次就此说明,“人坐在地球这颗行星上,不要买票,在宇宙里旅行。地球自转的里数,就是人旅行的里数。地球直径为一万二千七百多公里,乘以圆周率,即赤道长,约四万公里,再折合成华里,约八万里。”^{[6](P366,430)}毛泽东对

“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注解:“你要慢,我就要快,反其道而行之。你想活一万年,没有那么长。我要马上见高低,争个明白,不容许搪塞。但其实时间在我们这边,‘只争朝夕’,我们也没有那么急”^{[6][P368]}。这条材料反映了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真实心境,既有对国内国际敌对势力斗争的急迫心情,更有现实意义上的斗争策略。忽视了此点,就只能片面地解读或强调作者急迫的一面。

当然,毛泽东诗词自注大多是一时之间凭其记忆而作,难免有时会发生误差甚或讹误。例如认为“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5][P431]},对“武昌鱼”的批注说“三国孙权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5][P462]}即有讹误,这类注解也就没有什么具体的史料意义。

四、作者自注体现了作品意义的现实引申

在毛泽东对诗词的注解与说明中有一部分往往与诗词原作的历史背景有一定距离,更多的则是事后对自己作品意义所作的现实引申,反映的主要是注释当时的认识与心境,这一类自注的史料意义尤显特殊。试举二例析之:

毛泽东批注《七律·长征》中的“三军”曰:“三军,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不是海、陆、空三军,也不是古代晋国所作上军、中军、下军的三军”^{[5][P461]},此后注家每及于此便大多采用作者自注,或将其泛指为“红军全军”。从红军长征的历程特别是本诗的具体创作情境来看,作于1935年10月初的《七律·长征》中的“三军”是不包括红二、四方面军的,当然更不能指代红军全部,依据该诗写作的历史环境而言,“三军”显然是作者化用旧籍典故借以指代在毛泽东亲自率领下,参加了翻越岷山战斗的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陕甘支队。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1958年对“三军”作了这么一个并不符合历史情境的注解呢?作为重要史料,该注释反映了一个信息,即毛泽东对长征主体的认识先后之间发生了显著变化。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在毛泽东的意识和话语叙述系统中,长征的主体一直是指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而不包括红二、四方面军,这一点在其演讲、报告、文章中多有体现,最著名的就是1935年11月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该报告就已经对长征的意义作了精辟的总结性分析^{[7][P149-150]}。但1949年以后,毛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单纯地将长征主体认定为中央红军,长征是包括红一、二、四方面军的红军三大主力的战略转移行动。这个并不完全符合创作情境的批注其实正是毛泽东晚年对长征主体认识变化的心理反映。直到现在,毛泽东对长征主体的认识及其变化仍然对长征史研究范式有着重要影响,但其变化的心理轨迹却往往为人们忽略。

毛泽东自注《念奴娇·昆仑》主旨,“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错误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5][P461]},如此则赋予该词崭新含义。《念奴娇·昆仑》和大约创作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所反映的都是作者长征胜利后豁然开朗的心情,正如诗人所言:“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

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5][P460]}。当时中共与红军的最迫切的斗争目标仍然是继续反抗并打破蒋介石的军事围剿,在实践层面尚未完全转变到抗日,也就是说“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这和毛泽东对“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中“苍龙”的解释——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5][P461]}——是基本一致的。可见《念奴娇·昆仑》最初立意主要当指反蒋,当时中共话语系统中是把英美看成蒋介石的后台与靠山,所谓“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中国”正好巧妙地指代英美派蒋介石。作者将“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即考虑到日本人后,则全诗主旨顿改,如其所言“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这也反映了此时的毛泽东对国内国际形势的认识与判断已悄然发生新的变化。对《沁园春·雪》的批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5][P461]},在赋予作品全新含义方面和《念奴娇·昆仑》的自注有共通之处。这类自注,虽然和创作情境已有相当距离,但对于反映作者建国以后思想意识的变化情形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意义,甚至是其它一般材料无法替代的。

由于事隔多年,部分讲述创作背景的自注,往往体现了注解时进行的想当然的回忆与加工。例如,毛泽东对《清平乐·会昌》中“踏遍青山人未老”句作注,“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机,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5][P460]}。通读《清平乐·会昌》,尤其是其中的“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是读不出多少郁闷心情的,相反却能真切感受到作者的乐观与自信,那么作者的乐观与自信来自于何处呢?毛泽东在遭受长期冷遇后有机会到会昌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使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南线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同北线接连遭受严重挫败的形势形成鲜明对照”^{[3][P326]},所以才有“风景这边独好”和“更加郁郁葱葱”的感慨。所谓郁闷的心情是就长征前的总体而言,并非该词的创作背景,这首词也不能反映郁闷的心情,作者自注只是作注时“回忆与描述”的表现,这类自注的史料意义具有特殊性。所以我们在学习和运用毛泽东诗词时,一方面不必完全拘囿于作者自注,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认识诗人自注的史料意义。

参考文献:

- [1]陈晋.“突围”心路——毛泽东晚年诗词辨析[J].党的文献,2003(3).
-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C].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 [3]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 [4]张贻玖.毛泽东和诗[M].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
- [5]毛泽东文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6]毛泽东文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7]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